

中国新诗史略



昨夜星辰
凤凰涅槃
风从远方来
我爱这土地
为了一个梦想
动乱年代
一个世纪的背影
生活永远始于今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谢冕 著 刘福春 插图

中国新诗史略

谢冕 著 刘福春 插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诗史略 / 谢冕著 ; 刘福春插图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9

ISBN 978-7-301-28405-6

I . ①中… II . ①谢… ②刘… III . ①新诗 - 诗歌史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 ①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2163 号

- 书 名 中国新诗史略
ZHONGGUO XINSHI SHILUE
著作责任者 谢冕 著 刘福春 插图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40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 刷 者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410 千字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绪 论 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6）	I
---------------------------------	---

百年来一件大事——变革源于忧患——诗体大解放——嬗变从未止步——血脉依然贯通——自由是生命线——音乐的文学——推进一体化——破冰之旅

第一章 昨夜星辰——中国新诗（1891—1915）	3I
---------------------------	----

被遮蔽的风景——形式束缚了内容——末世的辉煌——“诗界革命”之蓝图——勇敢的实践——一抹绚烂的晚霞——新诗纪事

第二章 凤凰涅槃——中国新诗（1916—1926）	6I
---------------------------	----

中国的青春——微光透过云层——诗体大解放——新诗的发表——向着社会人生——个性大解放——女神之再生——创造的时代——天边一弯新月——他们为新诗“创格”——新诗纪事

第三章 风从远方来——中国新诗（1927—1936） 125

风是在哪个方向吹——红色年代——中国的新梦——初潮之展开——
暴风雨中的海燕——瓶花与前茅——西风东渐——雨巷华丽转身——
新诗纪事

第四章 我爱这土地——中国新诗（1937—1948） 161

灾难降临的时刻——中国怒吼了——抒情的放逐——战斗的鼓点——
从芦笛到号角——延安的想象——民族的和民间的——抉择与坚
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新诗纪事

第五章 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 239

放声歌唱的年代——“一体化”的宏图——第一关键词是颂歌——抒
情主体的移位——“百花时代”——“新民歌”与“开一代诗风”——
自由与格律再思考——现代主义幽灵——彼岸悲情——新诗纪事

第六章 动乱年代——中国新诗（1960—1975） 299

颂歌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主潮——“文革”诗歌模式——红卫兵

战歌——无声的厮杀——定格于四点零八分——持灯的使者——
新诗纪事

第七章 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6—2000） 343

重新开始的时间——悲喜交集的归来——在新的崛起面前——后新诗
潮的挑战——心不会被隔绝——世纪绝唱——新诗纪事

第八章 生活永远始于今天——中国新诗（2001—2010） 399

不是开始的开始——遭遇并陷入世俗——平民意识与口语化——欲
望表达及“下半身”——另一种乡愁——大地曾经摇撼——诗歌没有
陷落——新诗纪事

结语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443

后记（一） 谢冕 470

后记（二） 刘福春 472

绪 论

前进的 和建设的

——中国新诗一百年

(1916—2016)¹

1 中国新诗的纪元从何年算起，迄无确论，这里的1916只是个约数。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朱自清未提及的另一个年份是1917年2月即《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一刊物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这样一排列，试验新诗的年份分别为，胡适起手试验新诗的民国五年，是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诗八首，是1917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正式发表三人诗作的年份民国七年，是1918年。这些年份，都可视作百年新诗的发端之年。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介绍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民国四年（即1915年）开始，就与友人梅光迪等讨论新诗革命的问题：“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胡适著名的诗学主张“诗国革命何自始？要使作诗如作文”，也是这一年写给友人任叔永的。

百年来一件大事

这一个小标题是仿胡适的。1919年胡适在《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的约稿作长文《谈新诗》，在此文正题的后面加“八年来一件大事”为副标题。文章的开头，胡适列举辛亥革命以来的种种预期均告失望，层出不穷的是“一种更坏更腐败更黑暗”的政治丑行。胡适说，“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无谓的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的新诗”¹。胡适这些话讲于百年前，回望这20世纪的百年，中国和世界发生过很多事，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从热战到冷战，留下的是伤残的肢体、妻子和婴儿的哭泣、废墟、集中营，还有墓场。诗人罗门写了其中的一座墓场：菲律宾，马尼拉，郊外，一个叫麦坚利堡的地方。那里埋葬了“二战”中死亡的七万名美国士兵——

死神将圣品挤满在嘶喊的大理石上
给升满的星条旗看 给不朽看 给云看
麦坚利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
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 挂入死亡最黑的背景
七万个故事焚毁于白色不安的颤栗
史密斯 威廉斯 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
神都将急急离去 星也落尽
你们是哪里也不去了
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²

诗人艾青同样用诗句表达过他对和平的期待——他写当时尚未拆除、又高又厚的柏林墙挡不住花香，也挡不住蝴蝶的翅膀。在中国大地，一百

1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1919年。

2 罗门：《麦坚利堡》，《罗门精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年的时间空间都被泪水和血痕充填。一场战争接连另一场战争，一场动乱接连另一场动乱。也是一百多年前，清末一场维新运动中，几位先驱者血洒北京菜市口。其中的谭嗣同有诗句留世，那诗句表达了方生未死之间中国人的悲怆：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³

这神州大地，不间断的征战和动乱，曾经硝烟，曾经饿殍，曾经山崩地裂，曾经血泪成河。巍峨的宫殿，雄伟的城墙，智慧的典章，可以在任何堂皇的名义下轰毁而无所存留。而得以与日月共辉煌的唯有诗歌。这正是：“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曾记得安徽有个六尺巷的故事，“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没有千秋万世，其实，长城也在不断坍塌之中。永生的却是这首小小的诗歌。这就是胡适当年视为较之世上万事万物“比较有趣”的、亦可说是永恒的话题：诗的产生与建设。一百年过去了，战乱留下的是痛苦和哀伤，而诗歌却始终勃发着生机，不断给予人们以美和喜悦，是人类心灵的安慰。

中国新诗的一百年，是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表面上看，古典的诗意和韵律受到了有意的“轻慢”，而建立中国诗歌的新天地却是一项革故图新的诗学创举，是在古典辉煌的基础上另谋新路从而使传统诗意获得现代更新的头等大事——它不仅成就了千年诗歌史的大变革，而且开启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历史新篇章。

3 谭嗣同：《有感一章》，《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40页。

变革源于忧患

这一次空前的诗学嬗变，表面看来很像是一场纯粹的西化运动，因为倡导者并不讳言他们理想的诗歌模式取法于西方。中国新诗的草创期，它的模板便是西方诗歌，其基本理论资源也来自西方。胡适甚至把译诗《关不住了》称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⁴。当然，最著名的断言来自当年新月派的理论台柱梁实秋：“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好的，我们应该充分地欢迎它侵略到中国的诗坛。”⁵这些斩钉截铁的断言，印证了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的非同一般的渊源。

中国新诗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废弃旧的诗歌模式，建立新的诗歌模式，其主要标志是：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代替格律。这是新诗创造者改造旧诗的大手笔，也体现他们坚定的意志和宏远的眼光。举凡熟知中国文化的人都承认，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业已创造了不可企及的辉煌，它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的骄傲。但一场诗歌革新的举动，竟然以“毁坏”几千年古典诗歌造就的旷世之美为代价，人们不免要问，到底出于何种考虑？那些急于革故图新的人们，为何不惜以新生的、同时也是粗粝的白话诗取代成熟的、同时又是精美绝伦的古典诗？到底为了何因，那时的先行者竟然下了这般破釜沉舟的决心，必欲以与中国古典诗歌彻底决裂的姿态而为中国诗歌另造新天？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从中国近代史的背景去找原因。大约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清道光、咸丰（1821—1861）年间，特别是公元19、20世纪之交，正是中国社会空前危难的时刻。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社会陷入生死存亡的挣扎之中。1840、1860年间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国门破敞，外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终

4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

5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于导致京城沦陷，帝后出逃，圆明园沦为废墟。历经道、咸、同、光数代，割地赔款如同家常便饭，国人哀忍于心。19世纪末，危机愈演愈烈，1892年，沙俄出兵帕米尔，掠我二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隔二年，1894年，日海军击沉我援朝之高升号兵船；是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迎战日军于大东沟，管带邓世昌战死。再一年，1895年，日军袭击我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定远、来远、威远、靖远先后被击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拒降，服毒自尽。

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也是国耻之年的1895年，康梁始议变法图强，乃有“公车上书”之举。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是年9月21日六君子惨烈弃市，变法告终，世称“百日维新”，中国近代第一场革新之梦破灭。中国面临的危机，引发中国有识之士不竭余力地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那时的人们对世界缺少了解，对世界贸易和经济规律也缺乏了解，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诸中国传统的文明。外国历史学家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

只是在经过许多灾祸之后的19世纪90年代，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才被夹带而纳入儒家的意识，当作维新运动的必要纲领。最后，改革家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那些使帝国主义得以实现其野心的中国的传统。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苟齐其家，其谁敢侮之？”中国的力量必定来自内部。对于以古代经典培养出来的学者来说，鼓舞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的主要力量仍然来自它的过去。⁶

中国把挽救危亡的全部注意力，锁定了中国自身。知识界把中国危机的根源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旧文学。“一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却

6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

遭到不公的待遇。“五四”运动是一场挽救民族尊严而爆发的抗议浪潮，本是一个政治行动，很快就转换为对旧文化——其实即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明确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⁷

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中国的积弱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批判是有力的，也无过错。但事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让国人为之自豪的精华，也存在影响中国前进的消极成分。问题在于，把中国的积弱完全归咎于传统，认为这是中国的“病根”，并对之施以讨伐和全面否定，此举难免失之鲁莽和轻率。那时的人们面对无边的暗夜，救国无门，急切中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痼疾，从而把文化的批判和革新视为救亡图新、重铸民魂的唯一出路。我们从“五四”的先驱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愤懑和激情。鲁迅从事文学的经历便是如此，他由寻找医治身体的“药”转而寻找疗救民族精神的“药”。鲁迅自述，这种转变起因于一次围观示众的、令他震惊的画面：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⁸

这就是“五四”那一代作家的心路历程。中国新诗的革命运动走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早在《清议报》于横滨出版之初，编者

7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页。

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

即在该报设“诗界潮音集”发表诗歌，这种在新型的传播媒介发表诗歌的举措，传递了立志诗歌变革的意愿，实为正在酝酿中的诗界革命之先声。在正式提出新诗革命之前，业界沿用的“诗歌改良”的实践始于黄遵宪。1891年，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⁹他在思考，想在古典规范中“突围”，改良旧诗的意愿是坚定的，但毕竟障碍重重，他无法超越。诗歌改良的步伐于是就停止在他这里，他到底只是一位最初的勇敢探索者。

查文献，使“诗界革命”一词首先见诸笔端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游历夏威夷并写作《夏威夷游记》，正是戊戌政变流亡去国的一次远游。即使在这样万事萦心的背景和心境下，梁启超依然没有中断他的诗歌变革的思考——因为他说过“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¹⁰，这当然涵盖了“必新诗歌”的理念。他殷切地呼唤发现诗歌新大陆的诗歌界的哥伦布和麦哲伦：“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¹¹随后，他亲自编选《晚清两大家诗钞》以倡导诗歌的解放。在此书题词中，他再一次深情预言：“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¹²

在这些先行者的心目中，文学和诗的变革将导致人心的变革，最后达于实现“群治”的大目标。诗歌的变革是与国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国难深重，人们想到的是通过改变诗歌（当然还有小说和文艺）以改变人心，这就是此刻我们要予以强调的新诗革命的理想诞生于忧患的事实。

9 黄遵宪：《自序》，《人境庐诗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10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文原刊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

11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

12 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作于1920年10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中华书局，1936年。

诗体大解放

在“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总体追求中，创造新文学，首先就是创造新诗歌，改变中国传统诗歌囿于狭小的文人圈子而严重与民众疾苦、社会兴衰隔绝的状态。“五四”新文学革命两篇宣言式的文字，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对于旧文学的揭露和批判，其核心部分是针对诗歌而言的。胡适文中提及的“八事”，举凡“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都是针对古典诗词的弊端而发的。在陈独秀的文章中，这种批判的锋芒更是直接指向了诗歌的“积弊”：“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¹³

革新者认为，造成这种诗与人、诗与世隔绝的病根一是文言，二是格律。而在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那里，这二者却是无法逾越的“天堑”——文言和格律令他们的革新难以举步。我们从前引黄遵宪诗歌改革的主张中发现，他为未来诗歌寻求的出路，他的设计蓝图，都被不由自主地限定在原有的古典框架内，冲破文言造成的障碍已非易事，其他如“复古人比兴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理以入诗”，无处不有“旧面孔”的阴影在。首先是言、文脱节，再就是五、七言体的拘束，他即使想立“新”，而脚跟却站在“旧”地，这“新”无论如何是立不起来的。这就是他们的“改良”终致失败的原由。

新诗实践者的以白话取代文言，以自由体取代格律体的决心就是据此而下的。晚清以来，对于诗歌与万众忧乐的脱节的不满已多有表达，改变诗歌现状，使之能够与现代社会的风云际会相谐，从而能应和日益精进的

¹³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此文作于1917年2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

世界潮流，其目标是明确的。白话写诗可使言、文一致，口上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再加上格律的打破，思想情感一如冲破闸门的水，可以无拘束地流淌。胡适清晰地表达了他关于创立新诗的理想，如下一段论述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¹⁴

这一段文字的核心意思在于，指出通过使用白话和冲破格律的自由体以促成诗体的大解放。只有诗体获得解放，那些影响社会进步、民心改造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精神才能得到承载和表达。也唯有如此，才最终使诗歌能够通往民心，影响并最终改善民心、启发民智。前已述及，整个的“五四”文学革命其缘起在于要以文学的革新挽救当前的危机。而他们认为，解救危机的最直接也最有效的途径，则是使诗歌和文学能够为民众所接受和亲近，从而提升全民的智慧和觉悟。

“五四”的先行者确认，他们寻找到了拯救中国衰危的“药”。为了疗救病入膏肓的社会，他们不惜以“破坏”精美绝伦的古典美的沉重代价创造新诗。看似一场大破坏的诗体大解放，其实质乃是人的思想冲破障碍的一场思想艺术的空前大建设。

14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第五张，1919年。

嬗变从未止步

这种“以夷为师”的“破坏”，终于使诗歌冲破了完美的、然而也是坚硬的格律的壁垒，以白话书写的诗歌终于获得了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自由。与这种成就取得的同时，接踵而来的则是历时久远的、对这番“大爆破”的质疑和拷问。最大的质疑是：这一新生的白话自由诗是否造成了与中国伟大诗歌传统的中断或割裂？更有则质问，既然承认这是“中文写的外国诗”，那么，它是否就此与中国诗歌分道扬镳了？这里有一段文字，传达了新诗创立初时读者对此的普遍疑虑：

《新青年》提倡新文学以来，招社会非难，也不知道多少。……其中独以新体诗招人反对最力。我们对社会这种非难，亦应该分别办理。一种是一知半解的人，他们只知道古体律体五言七言，算是中国诗体正宗；斜阳芳草，春花秋月，这类陈腐的字眼，才足以装点门面；看见诗有用白话做的，登时惶恐起来，以为诗可以这般随便做去，岂不是把他们的斗方名士派辱没了么？¹⁵

对这一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其实，从中国数千年诗歌历史看，诗歌的应时变革是恒常的状态，诗体的更迭一般并不意味着倒退或停滞，反而意味着诗歌应和时代的前进和发展。文随世变。社会、民情、习俗、风尚、趣味特别是语言都在悄悄地和缓慢而持续地演变。这些人们不易觉察的因素，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无不影响着诗歌的走向。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语言的变化。口语总是如不肯停步的野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停地改变着人们的言说。而诗人写作则须对语言持一种不离不弃的虔诚。无疑，生活复杂化了，新的词汇随之涌现，这些新词不断地膨胀

15 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着，要冲破旧设的藩篱，于是就有了改变现状的革新表达的诉求。

静则思变。从漫长的诗史看，一个时代的诗歌一旦成型，必然酝酿着一场新的艺术革命。定以蓄变，新陈代谢，这是世间万物始终存在的潜隐的规律，诗歌也是如此。史书载，我国最早的“诗”，多为极短句构成，最简的是《弹歌》，见于《吴越春秋》：“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八个字，有韵，节奏感强，展现了一个飞动的画面。这是先人的智慧。早期的古典诗歌，以《诗经》为代表，基本是四字成句，四个字在我们的先人那里，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表达复杂的情感和精致的内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诗句）整齐的句子，鲜明的意象，深刻的情思，以及优美的音韵，戍卒怀乡，内心凄苦，时隔千载依然楚楚动人。

四言体因为艺术和思想的成熟，把《诗经》从“诗”神奇地转换为“经”，使诗歌完成了中华文化的经典定位。中国诗歌以此为起点，开始旷古的远征。四言诗在曹氏三父子手中做到了极致。三曹中，尤以曹操成就最大。他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均为中国古典诗的经典之作：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曹操，《短歌行》）

这些四字组成的短句，相当饱满地展现生命的全部丰盈，时空辽阔，沉雄深厚，起伏跌宕，声韵悠远，人生功业与荣辱的彻悟融于其中，堪称千古绝唱。不难看出，从“杨柳依依”到“青青子衿”，四言诗已经创造了一个神奇而恢宏的诗歌时代。但是诗史并不就此止停，它仍在悄悄地、不停顿地积蓄力量，筹划着一场更为久远的、可以说是另一个划时代